

Salerno, J. T. (2010). Menger's causal-realist analysis in modern economics. *The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23(1), 1-16.

熊越 译

本文仅供研究使用，不一定代表译者观点

现代经济学中门格尔的因果-现实主义分析*

约瑟夫·T. 萨勒诺 (Joseph T. Salerno)

摘要 卡尔·门格尔 (Carl Menger) 开创了一种独特的理论研究方法，为早期奥地利经济学派奠定了基础。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Ludwig von Mises)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将门格尔的因果-现实主义分析恢复并正式化为“行动学方法”。冯·米塞斯的学生穆瑞·罗斯巴德 (Murray Rothbard) 在他 20 世纪 60 年代初发表的论文《人，经济与国家》中利用这种方法阐述了一个全面的经济理论体系。罗斯巴德的论文成为 20 世纪 70 年代“奥地利学派复兴”的基础工作。在本文中，我们解决了与门格尔方法在现代经济学中的作用相关的几个问题。首先，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就自己的工作与早期奥地利学派的关系，冯·米塞斯和罗斯巴德都各自表达了令人惊讶的矛盾心理。其次，冯·米塞斯将罗斯巴德的论文视为经济理论新纪元的开端。第三，与传统观点相反，对他的论文的仔细分析表明，罗斯巴德在发展他的理论体系时大量借鉴了当代新古典主义文献，他的意图绝不是建立一个异端运动来挑战主流经济学。相反，他的主要目的是始终如一地应用行动学方法来将经济学从他认为的实证主义的异类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引入经济学）中拯救出来。最后，我将试探性地建议，作为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联合起来的智识运动的名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词现在可能已经超出了它的有效期。这个术语最初在促进广义的门格尔主义传统复兴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目的，但可能已经模糊了门格尔创始的行动学研究范式的意义和重要性。

关键词 卡尔·门格尔；穆瑞·罗斯巴德；保罗·萨缪尔森；实证主义；行动学方法

JEL 代码 B20; B25; B41; B53

我为我的演讲选择的标题是故意宽泛和开放的，因为我的目的是阐明一些仍然困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不同但相关的问题。首先，我将描述我所看到的门格尔理论研究方法的精髓，以及他的一些追随者，尤其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穆瑞·罗斯巴德是如何在 20 世纪将其正式化和朝着特定方向发展的。我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在看待自己的工作与早期奥地利学派之间的关系上，冯·米塞斯和罗斯巴德各自令人惊讶的矛盾心理。第三，我将说明罗斯巴德在他的论文《人，经济和国家》中如何利用这种“行动学方法”来构建经济理论体系。第四，我将指出迄今为止罗斯巴德在发展他的经济机构时在多大程度上借鉴了当代文献，并认为罗斯巴德撰写他的论文的意图绝不是要发起一场异端运动来挑战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最后，我将试探性地提出，作为 1974 年在南罗约顿会议上联合起来的智识运动的名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词可能已经超出了它的有效期。这个术语最初在促进广义的门格尔主义传统复兴方面具有

* 在 2008 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发展协会做出的主席演讲。

重要的战略目的，但可能已经模糊了门格尔创始的行动学研究范式的意义和重要性。

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做一个简短的学说概述。1871 年，随着卡尔·门格尔的开创性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的出版，现代经济学的时代出现了。在这本薄薄的书中，Menger (1981) 介绍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计划，并详细阐述了它的许多直接影响。特别是，作为一名断断续续从业十多年的经济记者和日报市场分析师，门格尔试图找出决定他观察到的每日市场支付的实际价格的因果律（causal laws）。¹ 他的目标是制定一个适用于所有时间和地点的综合价格理论。正如 Menger (1981, 49) 在他的书的序言中所写：“我特别注意研究涉及产品及相应的生产要素的经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为的是在，以**现实为基础**建立一种价格理论，将所有价格现象（包括利息、工资、地租等）置于一个统一的观点之下……”【强调为后加】

门格尔的调查使他发现，定价过程最终可以追溯到消费者的选择和行动，他们努力通过“精打细算”稀缺的手段（他称之为“经济财货”）来满足他们最重要需求。他的结论是，所有产品价格、租金、工资率和利率都是相互关联的，是个体消费者根据其主观价值或“边际效用”（由他的学生弗里德里希·维塞尔创造的术语）在不同财货的具体单位之间进行价值判断的系统性结果。有了这种洞见，现代经济学就诞生了。

门格尔所开创的这种“因果-现实主义”的经济理论方法很快开始在奥地利吸引杰出的追随者，并在不久之后，在整个欧洲大陆和英语国家都受到了关注。后来被称为“奥地利学派”——被德国历史学派反对者创造出来的一个贬义词²——的东西在声望和数量上迅速增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基于因果-现实主义方法的理论研究被认为是最前沿的经济理论。由于我在其他地方处理过的各种原因，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学派经历了急剧的衰落，特别是在英美和奥地利本身。到 20 世纪 20 年代，在英美甚至欧洲大陆部分地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部分均衡方法使门格尔方法黯然失色。随着 20 世纪 30 年代初莱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的数学一般均衡方法进入英语世界，它的耀眼程度进一步下降。不久之后，因果-现实主义范式几乎被凯恩斯革命所埋葬。因此，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一个自觉的、制度化的积极从事门格尔主义传统的教学和研究的经济学家网络已不复存在。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种被称为“新古典综合”的令人窒息的新正统观念降临在经济学上，尤其是在美国。这种“综合”实际上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压倒了门格尔主义因果-现实主义方法的三种不同方法的大杂烩。它将马歇尔和瓦尔拉斯的价格决定方法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混为一谈。前两种方法狭隘地侧

¹ 有关门格尔生平和思想的概述，请参见 Salerno 1999a 及其引用的资料。

² 这种流传已久的说法出自 von Mises 1984。但根据一些先前只存在于德语区的历史文档，Schulak and Unterköfler 2011, 27–28 表明，“奥地利学派”这一标签并非（如米塞斯所说）是一种由德国历史学派首先发明的蔑称。本文发表于 2010 年，所以萨勒诺当时应该没有接触过这些材料。——译者注

³ 关于早期奥地利学派兴衰的因素，参见 Salerno 1999b。

重于分析单一市场（部分均衡）或同时所有市场（一般均衡）中不现实的均衡价格的确定。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完全否认价格体系在协调面临“总需求失败”的经济的各个部门方面的功效。后一种情况被认为是导致大萧条的原因，凯恩斯和他的早期追随者进一步声称这是市场经济的特有特征。因此，新古典主义综合宣称，只有当政府巧妙地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维持经济中的总需求或总支出水平足以吸收充分就业水平的产出时，价格体系才能有效地分配稀缺资源。

这种新的正统观念也促进了超专业化（hyperspecialization），并相应地将经济科学解体为一系列细分的子学科。甚至经济学的理论核心现在也被分成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它们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专业期刊激增并导致研究文化发生根本性变化，对最新期刊文章的写作和阅读非常重视。出版的少数书是技术性专著或愚蠢的教科书；关于经济理论的系统化论文和经济学家作为其学科的大师的年代已经结束。⁴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少数反对这场知识革命的人之一。随着 1940 年《人的行动》的德语先驱《国民经济学》（*Nationalökonomie*）的出版，von Mises (1998) 恢复并极大地推进了因果现实经济理论体系。特别是，他将门格爾的价值和价格理论与他自己早期对货币理论的重述相结合。此外，他在更广泛的人的行动科学——他本人已在早期著作中阐述过这一点，现在又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中为整个经济理论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他现在将这种人的行为科学称为“行动学”（praxeology）。不幸的是，战后经济学界几乎完全忽视了冯·米塞斯的伟大论文。⁵然而，虽然它未能立即激发门格爾科学运动的复兴，但《人的行动》确实为其后来的复兴奠定了基础。1962 年出版的《人，经济与国家》点燃了这种复兴，并通过 1974 年的重大事件——在佛蒙特州南罗尔顿举行的奥地利经济学会议和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弗里德里希·哈耶克。⁶

由于《人，经济与国家》在奥地利学派的复兴中发挥了开创性作用，因此回顾罗斯巴德撰写本论文的目的以及他如何看待它与早期奥地利学派以及当代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学说之间的关系是有益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他研究和撰写这本书的 7 年中，两者都在逐步发展。罗斯巴德在此期间撰写的未发表论文、通信和备忘录为罗斯巴德不断发展的项目概念提供了重要洞见。

当罗斯巴德开始着手编写一部最终变成了一部全面论著的作品时，他所构想的是一本既适合非专业读者，也适合大学教学的书，它将“米塞斯所建构起来，但或多或少预设了他的读者理所当然地会理解的那座大厦呈现出来，并【阐明】其一步步演绎的性质。”（Rothbard 1952）。这是必要的，因为《人的行动》是针对学术听众的，因此冯·米塞斯假定他的读者十分熟悉他所说的“现代主观主义经济学”的许多概念和定理。因此，Rothbard (1951) 打算“为

⁴ 事实上，在其《人，经济与国家》序言中，Rothbard (2009, LI) 哀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关于经济‘原理’的老式论文”的消亡，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学（包括经济理论）逐渐分解为细分的子学科。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剧这种经济分裂的因素，请参见 Salerno 2004。

⁵ 关于其原因，参见 Salerno (1999b, 59–61)。

⁶ 罗斯巴德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现代复兴中的核心作用在 Salerno (2002) 中有详细说明。

米塞斯做麦卡洛克为李嘉图所做的工作”，也就是说，让聪明的普通读者能够理解他的作品。

但罗斯巴德很快意识到他最初的计划有缺陷，并且出于三个原因不得不放弃。首先，传统的教科书格式在各种主题的安排和处理上过于杂乱无章，无法以罗斯巴德所设想的通过一步步逻辑演绎的方式经济理论的发展。因此，它不足以传达“一种横扫千军的感觉，一种整合和渗透健全经济学说各个方面的连贯系统的感觉”（Rothbard 1951）。其次，Rothbard (1954)发现冯·米塞斯的“经济推理法”存在“很多空白”，他必须自己“填补”。因此，结果是这本书“包含了大量”罗斯巴德本人的“原创性贡献”。

第三，当他着手写这本书时，罗斯巴德在研究文献和广泛阅读的同时，他开始意识到《人的行动》源于一个非常广泛的传统，其中包括更多的经济学家，而不仅仅是本土奥地利学派的冯·米塞斯和他的著名前辈和直接门徒（例如，弗里德里希·A. 哈耶克）。此外，随着罗斯巴德的阅读和写作，他越来越清楚这一理论传统的各个分支——除了奥地利的伟大著作，还包括许多重要的英美贡献——尚未完全整合，其原理还没有被充分描述在系统性的论文中。因此，Rothbard (1952)得出结论，“许多要点必须是原创或借助其他作品推导出来的”，因此“这本书不能简单地解释《人的行动》”。

因此，罗斯巴德提议的书在其写作过程中发生了转变，从对狭隘构想的奥地利学派的公认学说的直截了当的阐述，转变为详细阐述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并以许多原创甚至全新的推论和定理为特色的论文。

冯·米塞斯本人立即认识到罗斯巴德的贡献的深刻独创性和意义。von Mises (1990, 155–56)在他对《人，经济与国家》的书评中写道，罗斯巴德“通过出版了这样一部巨著、一部系统性的经济学论著，加入了杰出经济学家的行列……在他的论著的每一章中，罗斯巴德……都采纳了他的前辈们的最佳教义……并在其中添加了非常重要的观察……” von Mises (1990, 156–57) 继续将罗斯巴德的作品描述为

……对人的行动的一般科学（即行动学）及其实际上最重要和迄今为止最详尽的部分——经济学——的划时代贡献。今后，这些知识分支的所有重要研究都必须充分考虑罗斯巴德博士所阐述的理论和批评。

鉴于冯·米塞斯严格的学术标准和众所周知的在赞扬科学贡献上的吝啬，这对于一位 36 岁的经济学家所出版的书来说确实是高度赞扬。⁷更重要的是，冯·米塞斯显然认为罗斯巴德的著作开启了现代经济科学的一个新时代。

这个新时代的决定性特征是罗斯巴德在阐述经济理论体系时的严谨发展和对门格尔主义方法的一贯使用。作为评估门格尔方法的性质以及罗斯巴德对其的运用的一次前奏，重要的是考察冯·米塞斯对奥地利学派的态度，因为它并

⁷ 以下陈述表明了冯·米塞斯在这方面的态度：“同时在世的人，其工作对经济学做出了任何重要贡献的，从来没有超过 20 个”（von Mises 1998, 869）。

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直截了当，并且这显然影响了罗斯巴德的观点。早在1932年，冯·米塞斯就认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所有基本思想都已被他所谓的“现代主观主义经济学”的主流所吸收。根据 von Mises (2003, 228) 的说法，“奥地利学派和英美学派以及洛桑学派……仅在表达相同基本思想的方式上有所不同，并且……区分它们的更多是其术语和表述特质的不同，而非学说的内容。”现在，诚然，这一观点是在德国的一次经济学会议上发表的，当时的与会者中有许多人是仍有影响力的德国历史学派残余分子——他们反对各种经济理论。当然可以合理地辩称，鉴于这种情况，冯·米塞斯的言论旨在为经济学理论研究进行一般性辩护。事实上，一年前，冯·米塞斯 (von Mises, 2003, 175) 曾写道：“通过澄清价值与成本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避开在我们这门科学中具有误导性的函数概念，在现代经济学的领域中，奥地利学派已展现出优于偏爱数学公式的洛桑学派及其相关学派的优势。”

冯·米塞斯继续坚持认为“奥地利学派”这个标签是不合时宜的，他在1969年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篇出版物中宣称，自1921年门格尔去世以来，奥地利学派就构成了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完结篇章。当时，根据 von Mises (1984, 41)，

奥地利学派的所有基本思想，大体上都被接受为经济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人们不再区分奥地利学派和其他经济学。“奥地利学派”这一称谓成为经济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篇章的名称；它不再是一个学说不同于其他经济学家的特定派别的名称。

罗斯巴德追随冯·米塞斯，将“奥地利学派”一词诠释为经济思想史上一个重要运动的名称。在《人，经济与国家》的文本中，罗斯巴德不下十次地使用了加引号的“奥地利学派”（“Austrian” or “Austrian School”）一词，如果他指的是一个对当代读者来说只有历史意义的运动，就自然会这样说。他几次不加引号地使用这些术语，显然是指历史学说或争论，例如“奥地利学派-威克斯蒂德主义价格理论”或奥地利学派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关于价格与成本关系的争论。Rothbard (2009, LIV) 在他的第一版序言中提到“奥地利学派”的那一次，他是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这个短语中提到的，将这个词放在了引号内，并在动词为过去时的句子中使用这个词。

这种文本解释并不意味着罗斯巴德不认为他的工作延续了早期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所开创的伟大传统。事实上，Rothbard (2009, 357) 写道“经济学家中的神话，即奥地利学派实际上已经死去，没有更多的贡献了，以及它所提供的一切具有持久价值的东西，都被有效地陈述和整合进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原理》。”相反，关键在于罗斯巴德的目标是恢复和推进一个更广泛的学说传统，而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的作品无疑是其主要根源。因此，Rothbard (2009, LV) 在他的序言中说：“那么，这本书试图部分填补40年来的巨大空缺。”罗斯巴德在这里所说的“空缺”，将《人，经济与国家》的出版与最后三篇英文的系统性经济学论文——即 Philip Wicksteed (1967), Frank Fetter (1910) 和 Frank Taussig (1911)——的出版分割开来。⁸威克斯蒂德和费特的论文尤其属于

⁸ 罗斯巴德并不认为《人的行动》是“老式原理”，因为“它假定了相当多预先存在的经济知识，

罗斯巴德所说的“行动学传统”。他们的程序，就像他自己的程序一样，是“在基本公理的基础上缓慢而合乎逻辑地建立一座经济真理的综合和连贯的大厦”（Rothbard 2009, LV）。他的论文大量提及历史上的奥地利学派的主要原因是，Rothbard (2009, LIV) 认为该学派的成员“对这种方法的理解最好，并且最充分和最有说服力地使用它。简而言之，他们是‘行动学’方法的典型运用者。”

相比冯·米塞斯的“现代主观主义经济学”，罗斯巴德对“行动学方法”的提及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线，一边是那些使用门格尔的程序、从一些基本的现实事实逻辑地演绎出经济规律的人，一边是那些不这样做的人。“行动学”是冯·米塞斯对这一庄严程序——用于发现支配市场现象的因果律——的明确而自觉的阐述。早期的奥地利学派和他们的追随者，甚至一些比较优秀的古典经济学家，在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的情况下使用了这种研究方法。

行动学方法始于人的行动这一不言而喻的现实及其直接影响。然后，它引入了其他经验假设，这些假设反映了行动的具体条件，而根据这些条件，出现了经济学家试图分析的历史上特定的市场现象。因此，它必然是关于真实事物的。正因为如此，行动学方法对“代表性企业”、“完全竞争市场”或者“社会福利函数”之类的虚构和臆造来说毫无用处；它也不关心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和稳定性。

行动学方法对假想建构的高度选择性使用只有一个目标：系统性地阐述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其中包括一些有意义的命题，这些命题关于（现在、过去和将来的）世界经济现象的原因。正如 von Mises (1998, 65) 所说，行动学方法，

……仅从两个视角出发，研究在未实现的（unrealized）和不可实现的（unrealizable）条件下的行动。它处理的事态，虽然在现在和过去的世界都不是真实的（real），但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日期成为真实的。并且它会检查未实现的和不可实现的条件，如果需要这样的调查以令人满意地掌握现实存在的条件下正在发生的事情。

因此，von Mises (1998, 237–238) 总结道：“经济学的特定方法是假想建构的方法……它是行动学和经济学探究的唯一方法。”

门格尔和庞巴维克都通过使用这种方法制定了重要的定理。Menger (1981, 129–32) 利用非常像鲁滨逊·克鲁索——小说中的著名人物——的“一个孤立的农民”的假想建构来推导出边际效用定律，这正是因果-现实主义价值和价格理论的基础。庞巴维克（von Böhm-Bawerk 1959, 220–35）在将门格尔的价值理论详细阐述为一个完整的、用“边际对偶”来表示的价格决定理论时，诉诸了一个虚构的马-麦市场，该市场是暂时的和孤立的，其中每个潜在的马匹卖家都仅限于一个单位的该财货。这个市场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参与者既没有过去的市场经验，也没有对其未来配置的投机性预期来指导他们的选择。然而，门

并在其广阔的范围内包含了许多哲学和历史见解”（Rothbard 2009, LV）。

格尔和庞巴维克的理论的真实性是无可争辩的和持久的，并不取决于假想出来的行动条件是否在历史上实现过。

一个自给自足的农民和一个一次性易货市场的虚构建构使经济学家能够剥离除了对因果分析至关重要的行动条件之外的所有条件。因此，门格尔的漂流者没有足够的粮食来满足他对粮食的所有需求；庞巴维克马市场的产生是因为还存在着另一种除了马之外的稀缺财货的占有者，他对这两种财货的价值排序不同于马主等人的价值排序。

罗斯巴德认真对待冯·米塞斯关于假想建构的格言，并在7年中致力于运用和完善行动学方法来阐述经济理论的综合体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罗斯巴德将行动学方法的使用，而不是松散的主观主义导向，作为科学经济学的标志和决定性考验。在长期持续努力写作《人，经济和国家》的过程中，罗斯巴德因此成为了行动学研究方法的大师级实践者。他不仅巧妙地使用了 von Mises (1998, 237–257) 在《人的行动》中明确阐述的各种假想建构，而且还根据需要设计了新的假想建构，以帮助推导新的定理，以阐明经济现实中无法解释的特征。

让我们举一个详细的例子来说明罗斯巴德的程序。面对理清因果-现实主义的生产理论并使其系统化这个艰巨的任务，⁹罗斯巴德假设了一个由专用要素组成的假想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每个个体劳动者、每片土地和每件资本财货都不可改变地致力于单一产品的生产，并且不能转换用于任何其他生产过程。¹⁰罗斯巴德还想象了这个世界的两种变体。第一种是，给定生产过程的每个阶段的写作要素共同拥有该阶段的产品（即资本财货），由于所有资本财货的服务都体现在最终产品中，因此所有要素共同拥有出售给消费者以换取货币的最终财货。货币收入然后根据自愿合同的条款，在所有联合要素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在第二种变体中，单个资本家或资本家联合体在最终产品在市场上销售之前，预先支付参与合并过程的各种要素，以此换取每个阶段的资本财货和最终消费财货及其向消费者进行销售所获得的货币收入的所有权。¹¹

在这种建构的帮助下，罗斯巴德推导出了一些关于生产的重要定理和原理。首先，在协作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共同拥有产品的情况下，不存在独立的、原始的资本财货所有者，资本财货是生产过程中的中间财货，因此可以分

⁹ 正如 Rothbard (n.d.) 在一份备忘录中所说：“米塞斯在生产理论方面的细节很少，因此它让我有了很多错误的开始，而且很多东西都被证明是白费力气，直到我得到了令我满意的好的生产理论。（它涉及从 90% 的当前教科书材料中解放出来。）”

¹⁰ 虽然这种构想非常不现实，但它并非像均匀轮转经济（简称 ERE）那样不可实现，后者完全从变化和不确定性中抽象出来，用于在分析上分离利息收入和从企业家利润中赚取利息收入的资本家功能。因此，一个所有要素都适用于一项且仅适用于一项任务的世界并非不可想象或在逻辑上自相矛盾。相比之下，ERE 确实是一个不可实现且自相矛盾的结构。它描述了这样一个世界，其中：例如，未来是完全确定的，但总是以改变未来为目标的行动发生了；尽管他们未来收支的时间模式不存在不确定性，但主体仍持有货币余额。这并不意味着接近现实会使一种假想建构比另一种更好或更有用；对建构的有用性的唯一检验，是它对推理在实际市场中运作的因果律的帮助。

¹¹ 有关此结构及其变体的解释及其含义的详细说明，请参见 Rothbard 2009, 329–66。

解为协作生产它们的劳动力和土地投入。其次，因此，生产中的所有收入都由工资和地租组成——资本财货只是通往最终产品的道路上的中转站，不会为其所有者赚取任何净租金。第三，所有协作的劳动者和土地所有者必须等待他们的收入：从生产过程的开始到其结束，以及随后将最终产品出售给消费者。因此，第四，协作要素所有者的总收入大小单独且完全地取决于消费者对其产品的需求。最终财货之间消费者需求的相对变化，将完全取决于受影响产品的生产中涉及的专用要素。

一旦在这个虚构的世界中引入资本家，第五条原理就立即显现出来了：资本家的作用是减轻要素所有者等待收入的负担，因为他用自己积累的储蓄，为他们的劳动和土地服务的联合产品预付现在的货币报酬。资本家在现在支付了工资和租金，作为交换，他从他的投资资金中获得利息回报，这是基于时间偏好的，并反映了他将收到的预期**未来**货币收入相对于他在要素服务上花费的**现在**货币支付的价值折现。反过来，要素所有者们同意从他们产品的全部销售收入中扣除资本家付给他们的折现工资和租金，因为这些现在的支付使他们摆脱了生产过程的时间维度的束缚。第六条原理是，即使在一个资本家拥有整个生产过程的世界中，资本财货仍然不会为其所有者产生净货币收入，因为资本家所有者所获得的净利息回报完全来自于包含在当前支付给劳动力和土地要素所有者（他们是一个没有资本家的世界中唯一的收入净获得者）的工资和租金中的折现。因此，工资、租金和利息收入合乎逻辑地用尽了最终产品销售的全部收益，没有剩余部分可用于资本财货的净支付。¹²

对罗斯巴德关于纯粹专用要素的假设世界的这种分析，也暗示了主观成本在生产和定价中的作用。鉴于专用的土地要素和资本财货在这个想象的世界中没有其他用途，我们可以直接推断出，它们在生产中的使用是“无成本的”，并且，它们各自的供给曲线完全没有弹性。相比之下，劳动力——尽管它可能专用于一个特定生产过程——的使用是有成本的，因为它在“闲暇”的生产中具有替代用途，而“闲暇”是一种即时可生产的消费者财货。因此，在一个没有资本家的世界里，劳动涉及到放弃闲暇和现在财货的负效用。资本家的出现减少了（但并没有消除）劳动的负效用。这些推论清楚地证明了这一原理，即所有生产成本最终和本质上都是主观的。闲暇偏好和时间偏好因此决定了生产的最终成本，这些成本纯粹是主观的，包括对生产者已放弃的效用相对于消费者预期的货币收入的评价。一旦这些（主观的）生产者成本全部发生，各种消费者财货的库存就会从生产过程中形成，准备出售给消费者。除非它们的生产者会直接使用这些财货，否则向消费者出售这些财货是完全没有成本的，它们的相对价格完全取决于消费者的价值排序的结构。因此，除非对未来价格变化进行投机，否则各种消费者财货库存的供给曲线也完全没有弹性。总之，“生

¹² 这个结论（即工资、租金和利息回报分光了生产收入）只有在未来市场条件是确定的假设下才成立。一旦放弃这一假设，并且承认资本家投资者可能高估或低估互补的专用要素，企业家利润和损失就会出现。然而，在一个纯粹由专用要素构成的世界中，此类利润和损失不会具有分配功能，因为根据定义，要素不能在生产过程之间转移。更重要的是，很明显，这些收入只属于资本家，因此，在有着不确定性的现实世界中，资本家和企业家的职能被整合到了同一个主体中。

产成本”——即生产者已经发生的劳动和等待的负效用，或者已经放弃的闲暇和即时享受的效用——在决定现有消费者财货库存的价格方面没有任何作用。

罗斯巴德还运用虚构的建构来推翻马歇尔主义的价格理论，根据该理论，价格由剪刀的两把刀片决定：一把刀片是消费者的主观价值，另一把刀片是客观生产成本或实际生产成本。尽管马歇尔和他的当代追随者们承认，在短暂的当前，主观价值刀片在决定价格方面占主导地位，但他们坚持认为，在显露出经济的各种永久趋势的长期均衡中，生产成本刀片起主导作用，因为每种产品的价格都符合其平均生产成本。因此，马歇尔主义者肤浅地得出结论，成本必须决定价格，至少从长远来看是这样。然而，罗斯巴德轻易地证明，在长期均衡或 ERE（它本身不是真实的，而是一种有用的假想建构）中，价格与平均成本之间的这种一致性，是确定暂时存在且在现实世界市场中进行交易的实际价格的相同原则的结果。罗斯巴德表明，在一个所有要素都完全专用于单个生产过程的世界中，长期来看，在没有企业家错误并且利润和损失已经完全被消除的情况下，在一个给定的生产过程中，协作的所有要素的支付总额严格决定于并完全对应于消费者在最终产品上花费的总收入减去资本家的利息回报。如果我们接受了这种演绎，并将总收入和总要素支付都除以产品数量，就会发现价格和平均成本相等的因果方向，**特别是**长期来看，是从前者到后者的。

罗斯巴德对这个由纯粹专用要素构成的假想世界的构想和运用，是行动学方法在理论研究中应用的缩影。正如 von Mises (1998, 328)所指出的，“假想建构设计的主要方法是从实际行动中存在的某些条件的运作中抽象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握这些条件不存在的假设后果，并设想其存在的影响。”因此，罗斯巴德首先设想，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产过程都归协作要素自己所有，它们必须忍受没有收入，直到最终产品出现并出售给消费者。通过首先分析从资本家的存在中抽象出来的事态，我们得以掌握他的功能，即在最终产品销售之前，向要素预付他所积累的储蓄，并理解其收入的性质，即对时间偏好——它在行动学演绎链条中早已确立，是行动公理的直接推论——的回报。在假设没有资本家的情况下，我们也假设了生产的货币成本，因为唯一的货币支付是直接来自消费者支付给最终产品的联合要素所有者。这使我们能够看到，总货币成本在本质上由消费者的这些总货币支出决定，并与之相等，这些总货币支出通过资本家进行传递，他们先前已将现在工资和租金预付给了要素所有者。

在后面的章节中，罗斯巴德开始放弃纯粹专用要素的假设，并在他的分析中承认要素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专用性。对于生产过程中相对非专用的要素，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调查它们的存在如何改变纯专用要素的假设世界的结果来确定它们的影响。由于非专用要素可以转化到生产过程的广泛范围中使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需求的相对变化将改变它们的分配，而只会暂时影响它们的价格。但是，已经推导出的关于专用要素的那些原理，仍然支配着这个更复杂的世界，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给定最终产品的总消费者支出变化，将首当其冲地影响过程中的相对专用要素的价格。因此，例如，在钻石需求相对下降的情况下，所有其他条件不变，钻石矿的资本价值和高技能珠宝匠的工资也会下降，而钻石矿工的工资和发电机的租金几乎不会发生变化，因为这些非专用要素会转移到其他就业岗位。此外，在分析中引入非专用要素，

将使生产的大部分货币成本看起来像是对要素的资本家-雇主给定，而与他特定财货的需求无关。结果，资本家将通过调整他的生产水平来应对成本变化，就像他在产品需求变化的情况下所做的那样。

因此，如果不像罗斯巴德和早期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那样利用假想建构的一长串演绎推理，肤浅地看待此事就会认为马歇尔的比喻（剪刀的两把刀片）合理地表示了现实。¹³如果不刻意地使用行动学方法，就不可能想象出，是消费者对各种生产过程的产出的需求，通过资本家-企业家的竞价进行传递，最终和完全地决定了所有要素（包括相对非专用的和纯粹专用的）的价格。

罗斯巴德如此巧妙地运用的这种行动学方法，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一直被用作——即使是含蓄而粗略地用作——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工具。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实证主义和数学模型使行动学方法和语言逻辑黯然失色。例如，战后时代的主要经济学家 Paul Samuelson (1993, 241) 现在坚持认为，经济理论的任务是“将事实组织成有用的和有意义的”模式，并以此提供对复杂现实的经济描述。因此，经济定理必须以一种“在操作上有意义”的方式来构建。根据 Samuelson (1976, 4)，一个有意义的定理“只是一个关于经验数据的假设，我们可以想象驳倒它，但只在理想的条件下。”这样一个定理是否是“错误的”，是否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其有效性是否是“不确定的”，对萨缪尔森来说，都不如它被构建成一个能够在原理上进行经验反驳的命题那么重要。对于 Samuelson (1968, 58; 1993, 241) 来说，定理将因此以高度简化的数学模型来体现和表达，**如果有数据的话，就可以被经验检验**。诚然，由于必要的数据很难获取，因此我们最多只能期待这些抽象模型“经常为复杂情况中存在的真理元素指明道路”，并且它们“能够提供准确程度尚可的外推和内推。”然而，Samuelson (1993, 243) 感叹了经济学中粗糙的实证方法很少取得成功，他在一次回顾中写道：

在我 20 岁的时候……我期望这门新兴的计量经济学能够帮助我们减少经济理论的不确定性。我们将能够检验和拒绝错误的理论。我们将能够推断出新的好理论……最终证明，不可能得到接近无可争辩的真理【并且】客观上似乎是这样的情况，即计量经济学的发现并没有汇聚成一个整体，汇聚成一个可检验的真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萨缪尔森对实证主义方法的信念动摇了。相反，它证实了他先前的信念，即真理是多面的，因此，根据 Samuelson (1993, 244)，**“确定性事实或概率法则中的精确，充其量只能是部分的和近似的。”**

如果说萨缪尔森淡化了以获取真理为理论研究的目标，而支持制定在操作上有意义的定理，那么战后经济学中实证主义的另一个化身 Milton Friedman (1970) 在评估经济定理的有效性时就抛弃了所有对真理和现实主义的提及。弗里德曼拒绝了萨缪尔森粗糙的逻辑实证主义，陶醉于对一个定理假设的错误或

¹³ 事实上，Rothbard (2009, p. LIV) 辩称，除了“整个剑桥学派推动”使用捷径（short-cut）假设之外，正是“马歇尔对‘长链条演绎’的不信任”导致了行动学方法的逐渐瓦解，并被实证主义所取代。

“非现实主义”，并提供了看似更复杂的“证伪主义”——据称基于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的替代方案。¹⁴ Mark Blaug (1986, 3) 简明地总结弗里德曼的立场，“没有关于经济行为的假设是绝对正确的，也没有任何理论结论对所有时间和地点都有效……”。

尽管在 20 世纪 50 年代学界的大多数都在形式上坚持实证主义方法，但罗斯巴德对恢复和重建健全的经济理论大厦的追求，驱使他像仔细研究其因果-现实主义传统的前辈的著作一样，仔细地在当代文献中寻找新的想法和见解。罗斯巴德的论文引用了 150 多个出版时间介于 1949 年《人的行动》问世到 1962 年《人，经济与国家》出版的来源（书籍、期刊论文、会议论文集、政府文件、博士论文以及政策和研究机构的专著）。¹⁵ 罗斯巴德对当代文献的深入研究得到了回报，因为他发现其中许多作品都含有澄清、完善或推进了因果-现实主义理论的研究，他热切地将这些贡献整合到了自己的作品中。

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采用语言逻辑和行动学方法的理论研究在学院派经济学家中仍然相对普遍，这一事实凸显了因果-现实主义传统的深厚而坚实的根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罗斯巴德还没有察觉到使用“奥地利学派”的标签来区分他的论文与当代经济学的任何优势。事实上，在私人通信中，Rothbard (1954) 表达了信心，认为主流经济理论家仍然可能会被拉回因果-现实主义研究计划，并且，“我相信”，正在进行的工作“将作为一本论著引起学界的关注，因为它在米塞斯未曾发展的领域进行了大量阐述，因为它在垄断、银行伦理和政府等领域与米塞斯不同……以及因为它对当前经济理论的反驳。”虽然回过头来，我们可能会对罗斯巴德的大胆预测不屑一顾，认为这是一种年少的乐观主义，但它反映出来的绝非一个意图与流行学说彻底决裂并建立一个异端思想学派的人的态度。

然而，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主流经济理论已经沉入了几乎深不可测的深渊，退化为一系列与现实几乎没有联系的松散相关的数学模型。按照流行的弗里德曼-实证主义方法论，这些模型的暂定“有效性”——绝不是“真理”——是通过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它们进行预测（或更准确地说，“回测”）的能力进行实证检验而假定建立的。至此，门格尔主义方法的最后残余从经济学研究生课程中消失了。因果-现实主义理论研究现在完全从学术期刊中消失，而这些学术期刊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话）研究渠道。

大约在经济理论和方法发生巨变的同时，在学院派经济学的官方组织和机构之外，一场新的智识运动开始联合起来，该运动直接受到罗斯巴德在《人，经济与国家》中重构因果-现实主义理论推理法的激发。这一运动主要包括对正统的新古典综合不满的美国学术机构中的研究生和年轻教员。由于肯尼迪-约翰逊时代的凯恩斯主义“新经济学”未能控制越南战争的通货膨胀，未能预测一

¹⁴ 一些方法论者认为，弗里德曼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与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只共享了词汇。例如，参见 Boland (1982, 155–96)。

¹⁵ 实际上，Rothbard (2009) 中的一些参考资料是 1962 年之后出版的作品，因为最新版本包括《权力与市场》，它最初是作为《人，经济和国家》的第三卷编写的，但在 8 年后单独出版。

——更不用说预防——随后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出现的滞胀，正统的新古典综合已经开始瓦解。

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新运动已经蓬勃发展，以至于有机会通过 1974 年 6 月在佛蒙特州南罗约顿举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正式学术会议来制度化和促进其存在。这场新的智识趋势之所以选择“奥地利学派”这个称呼，主要是出于战略原因。由于罗斯巴德主义运动所采用的方法和学说体系现在与根深蒂固的实证主义正统观念几乎没有共同点，因此该标签至少为该运动提供了与一个已融入现代主流的早期边际主义思想主要流派的可识别的联系。这个名字也立即赋予该运动以与奥地利学派创始成员（如卡尔·门格尔、欧根·冯·庞巴维克和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及其后来的代表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A. 哈耶克）的响亮名号相关的巨大声望。当哈耶克在当年晚些时候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共同获得者时，“奥地利学派”品牌的声望进一步提升。该术语具有识别这场运动的一般理论方向的额外优点。

罗斯巴德和他的追随者热切地接受了这个新名称，并开始称自己为现代奥地利学派——现在被定位为“主流经济学”的异端挑战者——的成员或追随者。然而，尽管它具有显著的短期战略优势，但将在南罗约顿会议上形成的学派标榜为“奥地利学派”却遭遇了许多严重的缺陷。首先，它掩盖了现代奥地利学派在多大程度上直接受到罗斯巴德的启发。的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南罗约顿会议的 30 名左右参与者中，绝大多数人都坚持《人，经济与国家》中阐述的因果-现实主义理论。¹⁶其次，它掩盖了这一事实，即如上所述，在撰写这本论著时，相比最初的奥地利学派及其直接智识后代所产生的文献，罗斯巴德从更广泛的文献中汲取了灵感。最后，这个标签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即罗斯巴德本人认为他撰写论著的主要任务是清除现代经济科学中外来的实证主义和数学形式主义元素，并按照一致的因果-现实主义路线重建它。这一点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罗斯巴德撰写《人，经济与国家》的目的，并不是与标准经济理论彻底决裂，并建立一个拒绝所有形式的均衡分析和假想建构使用的异端学派。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罗斯巴德在他的论著中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煞费苦心地解释了，在推导出关于可观察经济现象的因果决定因素的有意义的命题时，世界的虚拟建构和假想状态的性质和恰当使用。

罗斯巴德论著的每一页，都深刻地认识到他所阐述的因果-现实主义理论体系，是起源于 19 世纪 70 年代边际主义革命的国际经济传统的主流。因此，他的论著并非旨在作为新的异端运动或旧运动复兴的纲领。相反，它代表了在行动学方法不可动摇的基础上重建正统经济学，并用这种方法实质性地推进理论的努力。关键是，经济科学暂时失去了方向，开始偏离其丰富的遗产，罗斯巴德的目标是让它重回正轨。因此，他从未将经济科学的主流让给数学建模和实证主义方法的追随者，他认为他们是劫持了经济学的非理性主义邪教，其愚蠢的学说迟早会被丢进思想史的垃圾箱。

¹⁶ 伊斯雷尔·柯兹纳的精彩著作《竞争与企业家精神》（Kirzner 1973）于 1973 年出版，几乎立即被南罗约顿会议的差不多所有参与者视为对门格尔主义传统的重大贡献。然而，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它才对塑造奥地利学派运动和吸引主流同情者产生全面影响。

罗斯巴德已被证明是正确的。数学建模已经表明自己是徒劳的和形式主义的动作，无法解释过去 20 年席卷我们世界的国际货币危机、股市和房地产泡沫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甚至对专业经济学家来说也越来越明显的是，实证主义的曲折弯路导致了智识上的死胡同，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神经经济学、“幸福”研究等奇异的异端教派现在比比皆是。

现在，那些冒充经济科学主流的数学和实证主义者正在敲响丧钟。奥地利学派通过确认行动学方法作为经济学研究方法来恢复他们的正当地位——现代经济理论中心趋势的真正代表——的时机已经成熟。在《人，经济与国家》所阐述的综合理论结构中，这种方法的巨大成果就展现在我们面前。

参考文献

Blaug, M. (1986).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4th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land, L. A. (1982). *The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method*. Boston: Allen & Unwin.

Fetter, F. A. (1910). *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with applications to practical problems*. New York: Century.

Friedman, M. (1970).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in *idem*.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pp. 1–43).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irzner, I. M. (1973).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enger, C. (1981).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trans. James Dingwall and Bert E. Hoselitz.

Rothbard, M. N. (1951). Letter to H. Cornuelle (March 14), Rothbard papers. Auburn: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Rothbard, M. N. (1952). Letter to H. Cornuelle (June 28), Rothbard papers. Auburn: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Rothbard, M. N. (1954). Letter to R. Cornuelle (August 9), Rothbard papers. Auburn: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Rothbard, M. N. (2009). *Man, economy, and state: A treatise on economic principles with power and market: Government and the economy* (2nd ed.). Auburn: Ludwig von Mises. Scholar's edition.

Rothbard, M. N. (n.d.). Letter to R. Cornuelle, memo: “Textbook or Treatise?”; Rothbard papers. Auburn: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Salerno, J. T. (1999a). Carl Menger: The founding of the Austrian school. In R. G. Holcombe (Ed.), *15 great Austrian economists*. Auburn: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Salerno, J. T. (1999b). The place of Mises's human a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conomic though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2(1), 35–64.

Salerno, J. T. (2002). The rebirth of Austrian economics—in light of Austrian economic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5(4), 111–128.

Salerno, J. T. (2004). Economics: Vocation or profession.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Daily Article (November 17), <http://mises.org/story/1676>.

Samuelson, P. A. (1968). International factor price equalisation once again, in *The American Economics Association, Reading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Homewood: Richard D. Irwin.

Samuelson, P. A. (1976).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2nd ed.). New York: Atheneum.

Samuelson, P. A. (1993). My life philosophy: Policy credos and working ways. In M. Szenberg (Ed.), *Eminent economists: Their life philosoph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hulak, E. M., and H. Unterköfler. (2011).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A History of Its Ideas, Ambassadors, and Institutions*. Auburn: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译者注

Taussig, F. W. (1911).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2 volumes. von Böhm-Bawerk, E. (1959). *Capital and interest*, vol. II: *Positive theory of capital*. South Holland: Libertarian Press. trans. George D. Huncke.

von Mises, L. (1984). *The historical setting of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2nd ed.). Auburn: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von Mises, L. (1990). *Man, economy and state: A new treatise on economics*. In B. Bien Greaves (Ed.), *Economic freedom and interventionism: An anthology of articles and essays*. Irvington-on-Hudson: 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von Mises, L. (1998).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scholar's edition. Auburn: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von Mises, L. (2003).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3rd ed.). Auburn: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Wicksteed, P. H. (1967). In L. Robbins (Ed.), *The common sens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selected papers and reviews on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2 volumes.